

周恩来与蒋介石

●袁小伦



(三)

中原解放区以河南省桐柏地区为中心，纵横数百里，地处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横跨平汉铁路，南临武汉，北近许昌、洛阳，东接合肥，西连襄樊、南阳。中共部队雄据中原，就像一把利刀插在蒋家王朝的心腹之中，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战略上极为不利。因此，蒋介石把全面内战的突破口选择在这里。

面对 30 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中原解放区不但粮食极其缺乏，连饮水、柴米都难以解决，更谈不上药品。周恩来这时虽远在重庆、南京，但对中原情况了如指掌。他时刻关心着中原的严峻处境和 6 万人民子弟兵的安全。他向美蒋代表建议组成三人小组赴宣化店视察，解决中原军事冲突，并于 5 月 8 日中午，抵达宣化店。当晚，他听取了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等关于部队情况和敌我双方态势的汇报，分析了时局，就中原部队适时进行战略转移作了具体部署。

6 月 26 日，蒋介石认为其围歼准备就绪，就命令刘峙指挥 30 万大军对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并以此为起点，发动全面内战。他的如意算盘是：6 月份用 48 小时歼灭中原解放军，7 月份用两个星期占领苏皖解放区，8 月份用 3 个星期打通津浦线和胶济线，9 月份消灭冀热辽鲁和晋冀鲁豫解放区……5 个月内消灭中共及其所有部队，在全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

6 月 29 日、7 月 1 日中原部队分北、南两路主力先后越平汉铁路，突破所谓“铁桶”包围圈，然后分别向陕南、鄂西北方向前进，像两把利刀插到敌人的背后，钳制大量敌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晋冀鲁豫和华东野战军的作战。

中原战火的迅速蔓延，使中国人民又一次陷入战争的痛苦和灾难之中。7 月 3 日，由马歇尔提议，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南京商谈，双方就历次谈判

的问题作全面检讨，但毫无结果。会谈刚结束，国民党就悍然决定国民大会定于11月12日召开，不再变更。

7月7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对国民党单独决定召开“国大”提出书面抗议。

蒋介石对周恩来的书面抗议不当一回事，7月14日，他飞到他的夏都庐山避暑，密谋策划内战勾当。而周恩来则不顾盛夏酷暑在“长江火炉”南京为国家民族利益奔波。邓颖超曾在上海会见记者说：“周恩来因公忙碌，午睡既不可，夜睡也不能安，现在消瘦，无复年前之壮健。”

7月26日，周恩来会晤马歇尔并提出两项建议：一、颁发全国无条件停战令；二、停战令下后，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改组国民政府。马歇尔随即赴庐山转致蒋介石。蒋介石不仅不接受建议，反而于8月2日命令8架飞机轰炸延安。两天后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表示抗议。

蒋介石避而不谈延安轰炸事件，却于8月6日叫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自庐山飞往南京，向周恩来转达他提出的所谓“东北整军及中共部队在关内外驻地划分之方案”，提出5项荒唐条件，要求我军退出如下地区：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以及以南地区至迄冀东沿海；四、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即除去当时黑龙江和兴安两省、嫩江省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区以外之所有各省；五、1946年6月7日，中共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中解放的一切地区。蒋介石还声明：中共如不退出上述地区，国民党政府则不考虑停战问题。

10日上午，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与周恩来在南京会谈，诱迫中共接受蒋介石的5项条件。周恩来坚决拒绝了蒋介石的5项无理要求。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调处”失败。

8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坚持如期召开“国大”。18日，马歇尔在庐山牯岭致电周恩来，称政府拟扩大基础，共产党是否提出名单，参加改组后的政府。周恩来复电马歇尔，重申国民党政府尚未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关于改组政府的条件，故无意提出名单。21日，周恩来在南京会晤司徒雷登，重申无条件停战，切实履行协议决定，并认为全面停战为改组政府的先决条件。

2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指出：谈判症结所在，就是国民党政府无理提出5点要求。对此，我们拒绝考虑，拒绝接受。在改组政府以前，必须弄清政府是否放弃5项要求，是否马上停战这两个问题。我们欢迎美国调处，但反对片面帮助。争取和平主要依靠人民的力量。我们的态度是：“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要求无条件停战，根据政协决议办事。当国民党向我们进攻时，我们便唯有坚决抵抗，且动员解放区人民起来，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鉴于蒋介石一直在庐山牯岭避风，一方面让下面的将领放手大打，妄图造成以武力消灭中共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采用政治欺骗的手法制造和谈空气，以冲淡其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实，诱使舆论以为他还是愿意谈判，和谈还

是有希望的。9月1日开始，周恩来从南京到上海，住进马思南路107号“周公馆”，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彻底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他对记者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和谈还有希望的假象。蒋介石和美国方面在谈判中不讲理、施加压力，以为我们是怕他们，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我可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挫折，正处于僵局、停顿状况。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9月16日，周恩来第四次从南京来上海。19日，他在“周公馆”单独接见美国联合社记者，声明：“本人已暂时退出南京政府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代表进行无意义之磋商。此次磋商殆为掩饰中国内战情况，使中美两国民众不能获悉真相。”周恩来的声明，使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感到问题严重。26日，他俩联合致函“邀请周恩来将军早日返回南京”。27日，周恩来复函他俩，表示“催我回京，盛情可感，唯因真相未明，特请董必武先生代表我方与阁下等先行接洽。”他自己则继续留在上海。

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部署3路大军进攻解放区的军政中心——张家口以后，感到秋天已届，天气开始凉爽了，便返回南京。

国共关系濒于最后破裂的境地。9月30日，周恩来在上海致函蒋介石、马歇尔，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因此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蒋介石一意孤行。10月2日，他约见司徒雷登，宣布他“决意要攻取张家口，并决心保持这一点。”

10月9日上午，马歇尔突然由南京飞抵上海，登门求见周恩来，并于中午假伦中将的官邸宴请周恩来，然后又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当晚，周恩来会见报界人士，说明只要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中共愿意参加谈判。

10月11日上午，国民党军攻占了张家口，蒋介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下午，蒋介石发出命令：定于民国3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明目张胆地显示要以武力消灭中共，并彻底埋葬政协决议的决心。与此同时，为了欺骗舆论，又继续展开“和平攻势”，于17日派吴铁城、邵力子、雷震3人为代表，从南京来上海，要求会见周恩来，继续举行商谈。第三方面人士为此拜会了周恩来。周恩来为了尽最大可能争取和平、民主，表示愿意出席商谈。

10月21日上午9时，周恩来乘飞机离沪，10时10分抵宁，随即由孙科陪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毫无诚意，只是虚伪地做表面文章。当天下午，蒋介石即飞往台湾，致使在南京举行第二度会谈宣告失败。

11月15日，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终于在南京开场了，蒋介石内战独裁道路已经没有回头

的余地。和平大门完全被关闭，周恩来就要返回延安了。11月16日，他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记者很多，不少人不得不挤在门口、窗外和院子里。

周恩来先在会上散发书面声明。声明严正指出：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一手包办“国大”。“国大”一开，不但使和平谈判破裂，也彻底破坏了政协会议以来的一切决议，这是蒋介石企图把独裁、内战和卖国“合法”化。我们中共将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一起，为中国的光明前途而奋斗到底。

11月19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等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

(四)

对垒双方对这场战略决战前景均颇为自信和乐观。1946年12月7日，蒋介石对司徒雷登说：“要在苏联变为活跃之前，于1947年内结束共产党的问题。”12月31日，周恩来则在写给留居上海的郭沫若的新年贺信中预见“国内外形势正在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程途中进展，明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同胡宗南部部署进攻延安。胡宗南是“黄埔系”实力派首领，胡宗南集团乃蒋介石嫡系之“王牌”，有装备优良的34个旅，计23万人；该集团控制着西北广大地区，兼有四川等地作后方，以及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兵员补充，物资供应较为方便。

而中共在西北战场仅有4个旅，兵力不及对方的十五分之一，而且装备较差，弹药缺乏，虽有华北解放区可适当支援，但黄河阻隔，路途遥远，兵员补充，物质供应较困难。可见，敌我力量多么悬殊。难怪胡宗南向蒋介石立下军令状：“3天占领延安，摧毁中共和共匪的首脑机关，3个月内聚歼共匪于延安及其以北地区，或逼迫共匪东渡黄河，解决陕北问题。”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自洛川、宜川之线分两路北犯，直取延安。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对来犯之敌英勇阻击，在圆满完成掩护党中央、解放军总部和延安群众撤出延安后，对延安实行坚壁清野，19日主动撤出延安。

胡宗南进占延安城后，马上向蒋介石发出“捷报”：“我军经7昼夜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虏敌5万余人，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理之中。”夺回丧失13年的延安，光复“中国赤都”，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最大的喜讯了，更何况有此“战果”。他得意洋洋，旋于3月20日致电嘉奖胡宗南：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10余年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与蒋介石的估计相反，毛泽东和周恩来撤出延安后，并没有东渡黄河，进入华北，而是分别化名

李德胜、胡必成率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西北野战军根据胡宗南集团占领延安空城急于寻找主力决战的心理，诱敌深入，运用“蘑菇战术”，歼灭敌人。到5月份，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3个战役，接连歼敌3个旅，计14000余人。

与此同时，在山东战场上，蒋军“五大主力”之首、整编“王牌”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全歼，师长张灵甫等集体自杀。

蒋介石闻噩耗后哀叹“此乃我军剿匪以来最痛心、最惋惜的一件事。”他和陈诚立即赶到徐州怒斥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将救援无力的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撤职，并几乎要杀掉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十分伤心的蒋介石把原先准备好在南京的祝捷会改为追悼会，狂叫要把他的全部精力用到山东战场上。

随着“第一战场”的胜利，中共中央及时地发动了“第二战场”。5月23日发表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把人民的爱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国统区各级中共地下党组织，坚持贯彻党中央指示，英勇机智地战斗在第二战线上，与战场上的第一线互相呼应，使蒋家王朝处于全民的包围之中。6月，国统区60个大中城市学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几十个城市5000多个产业部门的3250万工人也参加“要生存，要饭吃，反对独裁专制，反对内战”的斗争行列；广大农民更是被逼上梁山，纷纷起义，反对抓丁征粮。民变之火，势如燎原，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蒋介石被迫派了几十万正规军对付国统区人民的反抗斗争。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在战略上虽保持进攻态势，但因机动兵力不足，在东北和华东战场已转为守势，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已成为强弩之末，中原地区兵力薄弱；人民解放军除山东、陕西战场外，其他战场逐步转入战略性反攻，改善了战略态势——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在敌方战略进攻尚未完全被粉碎，我兵力装备仍未优于敌人的情况下，果断地制定了全国性反攻的策略，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以加速战争进程。

8月初，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天险，歼敌5.6万人，胜利完成鲁西南战役后，又突然甩开30个旅敌军的分进合击，兵分3路向南疾驰，越过陇海线，涉越黄泛区，跨过沙河、涡河、汝河等重重障碍，于月底胜利到达大别山地区。随即一面牵制敌人，寻机歼敌，一面展开发动群众，摧毁反动势力，以卷席之势，迄九月底解放鄂豫皖边大部分地区，直抵长江北岸，如同一把利剑插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宁、汉之间。8月，陈谢太岳兵团于晋西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经3个月作战，歼敌4万余人，解放了豫西和豫陕鄂边广大地区；孤立豫西重镇洛阳，威逼潼关。陈粟华野大军在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兵进攻后，于9月挺进鲁西南并随即南越陇海线，于皖苏地区辗转歼敌，至11

月，共歼敌 10 余万，恢复发展豫皖苏解放区，孤立敌人的战略要点开封和郑州。3 大主力在广阔战线的品字形攻势，迫使敌人处于全面被动挨打的局面。在南征大军向外线进攻的同时，中共内线作战部队也先后转入反攻。人民解放军外线出击和内线战场的反攻相配合，组成了全面进攻的总攻势，迫使敌人把战线从黄河移到长江，从重点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五)

1948 年 3 月，为挽救垂危政局，止沸民怨，蒋介石决心召集“行宪国大”，再次取得“合法”地位，借以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1948 年 5 月 1 日，正当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举行“总统宣誓典礼”的时候，由西北转移到华北的中共中央发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号召。

开春以来，解放军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所谓“分区防御”的策略。西北、东北、华北、中原各地战场捷报频传。为了迎接胜利的曙光，夺取全国解放，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伟大的战略转移，东渡黄河，迁往华北。

3 月 21 日，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从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出发，5 月 26 日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在西柏坡期间，中共中央军委部署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 4 个多月，歼敌 154 万。在这场旋转乾坤的大决战中，指挥几百万军队于各个战区不断歼灭敌人，最后打垮蒋介石并解放全中国的最高统帅就是毛泽东；而作为最高统帅的总参谋、帮助统帅“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就是周恩来。

(六)

战局逆转，更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司徒雷登眼看蒋介石失势的趋势，便向美国国务院“建议委员长（指蒋介石）退休，让位与李宗仁。”对于美国的这个换马之计，桂系实力派白崇禧积极响应。白崇禧此刻坐镇汉口，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他手中握有 30 万能战之兵，驻守长江中游南北两岸。自东北、华北、华东会战以来，国民党嫡系主力损失殆尽，唯有这支力量尚保持完整。因此，他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12 月 24 日，他在汉口突然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表示民心军心都不能再战。他打着“和谈”旗号，借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野，好由桂系取而代之。25 日，副总统李宗仁、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发出通电，倡议与中共和谈，并要求蒋介石下野。30 日，河南省主席以及湘、鄂、豫、桂 4 省参议长亦发出请蒋介石下野的通电。同日，白崇禧再次发出主和通电，并警告说：“无论和战，必须速决，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作出下野的决定。圣

诞节那天晚上，他亲笔写下了“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两句诗，以作万般无奈之叹。

12 月 31 日下午，蒋介石邀中央执、监委委员约 40 人在黄埔路总统官邸聚餐，虽然餐厅里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氛，但在辉煌耀眼的彩灯下映出的，却是个个忧心忡忡的阴沉面孔，无人谈话，唯闻杯盘盏碟之声。党国的要人们都意识到这是蒋家王朝举办的“最后晚餐”。会上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元旦发表。现在请岳军（即张群）先生朗读一遍，征求大家意见。”张群念完全文，全场鸦雀无声，空气十分紧张，李宗仁坐在蒋介石的右首，不动声色。还是蒋介石打破沉默，问李宗仁对文告有何意见。李宗仁答：“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蒋介石此时再也难以自制，他火冒三丈，直言不讳：“我并不需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讲完随即要张群记录下这段话，然后拂袖而去。

1949 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作出要“和谈”和“引退”的表示。1 月 21 日，蒋介石于正午约宴五院院长，他以与平时激昂慷慨截然不同的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的语调，正式宣布引退。下午，蒋介石驱车至中山陵拜谒。他面孔严肃地站在中山陵前，默然无语，已悲从中来。距抗战胜利 3 年不到就江山易手，他怎能不悲愤懊丧。下午 4 时，他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他吩咐驾驶员恢复原，绕空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194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南京反动政府及其他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 8 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 8 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代总统李宗仁急于稳住国民党政府残局的阵势，上台后即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愿以中共所提“8 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并于 2 月 14 日，派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飞抵北平，以作试探。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石家庄接见了前来的代表，充分表示了对和平的诚意。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平山西柏坡移到北平。第二天，中共中央通过电台正式通知南京政府：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 4 月 1 日开始，于北平正式同南京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要求南京方面派遣代表团，依照上述时间、地点前来。

4 月 1 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代

代表团到达北平。经过双方接触和交换意见后，于13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故宫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将经过与各方磋商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正式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

4月16日，黄绍竑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飞返南京，请求政府批准。李宗仁不敢贸然决定，急派人赴溪口请示。蒋介石阅毕黄绍竑携回的那份《国内和平协定》后，即表示：“共匪对政府代表所提出的修正条件24条款，真是无条件的投降处分条件。其前文叙及战争责任问题数条，更不堪言状矣。黄绍竑、邵力子等居然接受转达，是诚无耻之极者之所为，可痛。余主张一方面速提对案交共匪，一方面拒绝其条件。”20日，李宗仁、何应钦联合通电，对《国内和平协定》予以全面拒绝。

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仍是国民党总裁，实权仍在他手里。他下野后，便积极部署长江防务，以便凭借长江天堑，负隅顽抗。他所谓的和谈只想拖延时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幻想在美国的庇护下，重新统治中国。麦克阿瑟曾对他表示：只要国民党能坚持一年，美国一定以全力来援助，因为美国目前正在国内做动员工作。正是由于对美国寄予希望作了上述部署，所以他敢于置国内外呼声于不顾，孤注一掷，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20日午夜，人民解放军在西起九江东北之湖口，东至江阴，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几天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次子还说：“长江自古是天险，曹操、苻坚都渡不过来，何况共产党。除非它是天兵天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说：“长江天险，共军没有海、空军配合，不易大举渡江。”当解放军渡江成功，彻底摧毁了“固若金汤”的国民党江防以后，汤恩伯于22日下午匆匆决定全线撤退。国民党军仓皇逃命，溃不成军。23日清晨，李宗仁登机飞离南京。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

4月25日，蒋介石离开奉化前，祭祖谒墓，自不在言，更主要的是他已有从此一别故土，何时重返的心情，其唏嘘感慨可以想象。他匆匆赶到上海后，即召集守备上海的国民党军队团长以上的军官在汤恩伯司令部训话。他重弹不出3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爆发，到那时美国就会恢复援助。再说上海兵力雄厚，固守3个月没有问题，并表示自己将留在上海不走，“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等等。蒋介石虽然佯装镇静，但当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发动攻击的炮声一响，他便悄悄地登上飞机，逃之夭夭了。汤恩伯也把司令部搬上了兵舰。

解放军乘胜追击，5月12日打响了淞沪战役，27日解放上海。至此，历时一个多月的渡江战役，取得了歼敌40万，解放长江中下游许多名城重镇和苏、浙、皖、赣、闽、鄂等省广大地区的辉煌胜利。

6月1日，败阵而逃的蒋介石在台湾高雄要塞度端午节。此刻，他惊魂初定，但心绪难宁。先寄希望于长江天堑，保半壁江山，结果美梦一场；如

今上海失守，伤及国际观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的反攻战略，亦成泡影了。蒋介石面对颓势难回，众叛亲离的残局，也只得追来逐去地力图挽救。他不停的来往于云南、广州、重庆、成都、台湾、厦门，只可惜真是时不与蒋兮，狂澜难挽。

中共各路野战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继续向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用战斗或和平的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

1949年11月28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进驻重庆市郊的南温泉，重庆已被包围。29日，重庆市内已闻炮声，从白市驿迁渝的国民党政府即日迁蓉，但却不见其最高负责人李宗仁。原来他早已于11月13日，即蒋介石来重庆的头一天，托言有病，突然飞港转赴美而去。这天中午，蒋介石在山洞陵园召集军政头目，布置撤退及对重庆的大破坏。晚上10时，蒋经国闻“枪声大作”，催促蒋介石“早离此危险地区”。当父子两个乘车开出山洞陵园时，“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小轿车在通往白市驿机场的途中，被阻塞3次，无法前进，蒋介石不得不下车徒步，“午夜始达机场。”当夜，蒋介石就睡在“美龄”号专机座仓里。11月30日清晨，“美龄”号离渝飞蓉时，解放军距离重庆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

重庆既失，成都无险可守。住在成都中央军校的蒋介石，知道四川守不下去，只想把胡宗南的残部安全转移到西昌去，在那里设立大本营，表示大陆还有地盘，以待国际局势变化。他表面上还是装腔作势，而实际上已是坐立不安，一筹莫展了。他每天关起门来对着军用地图发呆，不时责骂胡宗南。他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更是放不下心，经常请他们吃饭，借以监视他们。12月9日傍晚，传来刘文辉、邓锡侯、熊克武等秘密离开了成都的消息，蒋介石更加慌乱起来了。

正是12月9日傍晚，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和安排下，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离开成都，在雅安联名发表通电，宣布起义。

12月10日，成都市内秩序大乱，时闻枪声，势临绝境。蒋介石的侍卫人员发现“中央军校附近有可疑人物”，认为是刘文辉的便衣队，建议蒋介石赶快从后门逃走。蒋介石此时已知道刘文辉等起义的消息，他极为担心“西安事变”重演，于是携着蒋经国仓皇出逃。下午2时，“美龄”号专机在成都凤凰山机场升空，向台湾方向飞去。等蒋介石再从机窗往下望去时，眼底已是茫茫东海，大陆已经看不见了。

后来蒋经国回忆这次成都之行时说：“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福祸之间，不容一发。记之，心有余悸也。”

(编辑：张帆)